

# 舍人、盛览与西汉时期的儒学南渐<sup>①</sup>

张新民

**摘要** 西汉时期舍人注《尔雅》盛览从司马相如学赋,均为地方人物崛起于西南的标志,也是儒学南渐今黔滇两省的象征,不可不视为最重要的学术文化事件,故引起清季学者的广泛关注。重新梳理各种原始资料,详考其事迹影响,打通古今观照的视域,整合各种差异性的评说,可知中原与西南地区长期文化交往不断,边地儒学亦为华夏学术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**关键词** 舍人 盛览 汉学 清学 儒学南渐

**中图分类号** B234.99 **文献标识码** A **文章编号** 1002-2627(2017)05-0059-10

**作者:** 张新民,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兼荣誉院长,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文化史、历史文献学。贵阳 550025

两汉是中央王朝大规模经略开发西南地区的时期,儒学的南渐也随着国家力量的进入而日渐加强,西南地方人物的崛起于是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,其中最突出者即舍人、盛览、尹珍三人,他们都曾“北学中国”,具有典型儒家人格形态特征,说明儒学在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的流传传播,自汉武帝时期以来,至少已有两千年的历史。清人已将舍人、盛览、尹珍视为“汉三贤”;原始察终,寻流讨源,今人亦有必要以温情之态度重新总结。因此,笔者爬疏史料,勾稽众说,撰成此文,聊供同好参焉。

## 一、舍人及其《尔雅注》

考察两汉时期儒学的南传,就今贵州地区而言,最具标志性的早期学术文化事件即为汉武帝时犍为郡犍邑(今遵义)舍人撰《尔雅注》三卷进呈朝廷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·序录》“犍为文学注三卷”注“一云犍为郡文学卒史臣舍人,汉武帝时待诏,阙中卷。”<sup>②</sup>则陆氏尚得获见旧本,惜中卷已佚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“《尔雅》三卷”注“梁有汉刘歆、犍为文学、中黄门李巡《尔雅》各三卷,亡。”所云“犍为文学”,虽次于刘歆之后,然仍有可能本于《七录》<sup>③</sup>,则舍人必为西

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委托项目“阳明文化与现代国家治理研究”(项目编号:14@ZH054)的阶段性成果。

② 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,北京,中华书局,1983年版,第17页。

③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四十“经部小学类”《尔雅注疏》条,即据《隋志》断言《七录》载有犍为文学《尔雅注》三卷,并有按语云“《七录》久佚,此据《隋志》所称‘梁有某书。亡’,知为《七录》所载。”(北京,中华书局,1965年版,第339页)

汉武帝时人,合《经典释文》与《隋志》观之,似已无疑义。诚如清人莫友芝所说“前辈言《尔雅》家,皆不详文学姓名乡里,以《释文》本注云‘犍为郡文学卒史臣舍人’考之,于郡吏衔下加臣某,必其上此注时自题,则舍人其姓名也。”<sup>①</sup>足证舍人向汉武帝进呈《尔雅注》时,必自署其官衔为犍为郡文学卒史,并依朝廷君臣之礼,示明自己属于行政体系上下结构中的臣位,否则便不必在郡吏之下,再加臣某等字样<sup>②</sup>。

舍人生活的时代,恰值儒学地位不断上升,最终在制度上设立五经博士,遂一跃而为官学的时代。汉武帝建元元年(前140年),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,即当视为国家意识形态逐步调整,儒学已有取代汉初黄老之学地位之势的一大显著标志;建元五年(前136年),朝廷置五经博士,儒家经典则由民间私相传习,遽升为国家官制必备之正典,亦为儒学取得正统合法性地位的重大象征。在官方权力的诱导下,天下无不靡然向风,儒学俨然已成“国学”,经学的概念于焉成立,而相互授受以成世业者,无论人数规模或地域范围,显然也在迅速增加扩大。据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:“窦太后崩,武安侯、田蚡为丞相,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,延文学儒者数百人。”所谓“文学”云云,即为官职。考汉景帝时,便已“命天下郡国皆立文学”<sup>③</sup>,而武帝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,设五经博士,儒家由子学一跃而成为官学,故“文学”一职虽仍袭自旧职,却必由儒者充任,既用来兼指儒学或儒生,亦时或联用径称“文学儒者”,从而明示“黄老刑名”一类诸子百家之学已不能混杂羸入。具见舍人之出任“文学”一职,必在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之后,时儒生仕进之路已开,“文学儒者”遂得以广延入朝。尤其景帝末年,庐江人文翁为蜀郡守,即开始推行儒学教化工作,不仅蜀地一隅之学从此大兴,即儒学重振亦首开天下风气,前人所谓“蜀学之盛,冠天下而垂无穷者,其具有三:一曰文翁之石室,二曰高公之礼殿,三曰石壁之九经。盖自周道衰微,乡校废坏,历秦之暴,至汉景、武间,典章风化,稍稍复讲,……自尔郡国皆立学,实文翁倡之,所谓石室者存焉”<sup>④</sup>。遵义与蜀地毗邻,或根本就为一文化区,舍人之学极有可能受文翁影响,甚至有可能径入蜀地而受学。其既注《尔雅》,又充任“文学”,必能“游文于六经”(《汉书·艺文志》),乃今贵州地区最早可考的儒家学者。至于“卒史”一辞,见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之记载者颇多,均可见其可为郡一级的属吏,亦常为特定秩次的某些吏员的通称<sup>⑤</sup>。舍人既执掌“犍为郡文学”,即可称为“文学卒史”,或径直省称为“文学”,而“犍为初治警,警邑即今遵义,汉世文学卒史例为郡人,是舍人即遵义人”<sup>⑥</sup>。其人既为朝廷命官任“文学”一职于地方,则必然发挥了传播儒学的积极正面作用。

“文学”一辞为官职既明,当再考舍人之姓氏。按《广韵》:“舍,又姓。”莫友芝以为“舍姓

① 莫友芝《邵亭杂文赘录》卷一《犍为文学传》,见张剑等编辑点校《莫友芝诗文集》下册,北京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9年版,第696页。标点有改动。

② 参阅王燕玉《辨舍人的籍贯、官称和姓名》,见氏著《贵州史专题考》,贵阳,贵州人民出版社,1986年版,第347—354页。

③ 常璩著,刘琳校注《华阳国志校注》,成都,巴蜀书社,1984年版,第712页。

④ 吕陶《经史阁记》,见扈仲荣等编《成都文类》卷三十“记”,又见《全蜀艺文志》卷三十六“记丁”,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影印本。

⑤ 关于“卒史”的秩次、执掌、地位、升迁等问题,上世纪末江苏尹湾出土的西汉东海郡简牍《集簿》《吏员簿》均有所述及,详见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《尹湾汉墓简牍》,北京,中华书局,1997年版;另可参阅杨际平:《汉代内郡的吏员构成与乡、亭、里关系:东海郡尹湾汉简研究》,载《厦门大学学报》1998年4期。

⑥ 李独清《幽心梦影录》卷五,见氏著《洁园集》,贵阳,贵州人民出版社,2013年版,第336页。

别无所见,意其所据《姓苑》诸书,必有引注《尔雅》之‘文学’为证者。观陆氏于注中备录其衍,亦为备其姓名,使人有考。”<sup>①</sup>邹汉勋纂《大定府志》亦以为“舍人者,氏舍名人”<sup>②</sup>。检邢昺《尔雅疏》,凡引其书,亦多引作“舍人云”,皆可证“舍人”实乃人名而非官职<sup>③</sup>。具见《经典释文》正文“大题不云‘舍人’,而云‘犍为文学’者,盖当时此注,通如此称,陆虽得其旧本,原题骤改,恐人难即晓,故具之注中。又诸经疏所引《尔雅》旧注,多直称舍人曰,与孙炎、李巡、樊光等曰一例,益知舍人为姓名也”<sup>④</sup>。而“钱晓徵《与晦之论〈尔雅〉书》,已引《广韵》舍姓,谓舍人是姓名,非官称。赵竹冈《困学纪闻》笺,亦谓舍人是文学之名。前辈读书细密,已有先我而获者”<sup>⑤</sup>。作为必要的旁助佐证,均可知“舍人”二字,必当解为人名。

舍人所撰之书,唐代便已亡佚,即陆氏所见旧本,亦未见流传,然《齐民要术》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等均曾引及,邢昺《尔雅疏》更多甄采。虽吉光片羽,亦可旁助释经考史。沈廷芳《十三经注疏正字》卷七十九《尔雅》则以为“三卷”当系“二卷”之误,或原阙之中卷未计入,遂以二卷计之乎?清代考据学大兴,辑录者亦多,其中如余萧客、臧庸、王谟、叶心兰等诸家之本均较可观,而较为流行者,则为马国翰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本<sup>⑥</sup>。遵义赵旭(晓峰)与井研廖平(季平)均好治《尔雅》之学而兼及舍人之书。其中赵旭有《辑犍为文学尔雅注稽存》一卷,辑录舍人旧注二百余条,均一一分类为编,同邑郑知同尝序之云:“世以文学陋南中日久,谓罕淹通之士。以余论之,当汉代经学萌芽之始,而吾郡初入版图,已有大师如犍为舍人者,固未尝深究也。”<sup>⑦</sup>黎庶昌在其跋语中历述辑佚诸家版本源流,并详考舍人姓名身世,亦可略知赵氏辑录之功。廖平曾从宋学转入汉学,善治经而博览考据之书,撰有《尔雅释例》一卷、《尔雅犍为舍人注校勘记》一卷<sup>⑧</sup>,或当时未能刊行,故未见坊间流传。今观其比较《说文》与《尔雅》之言:“《说文》专明本义,《尔雅》则多非本义,此假借也。一字一义,《尔雅》一义至数十字,则又转注也。治《说文》易,治《尔雅》难。《说文》有形象可凭,合者为是,不合为非。《尔雅》则义与字形全不依附,一字兼见数义,俗体重文杂出其中。故说《尔雅》者皆影响附会,不及《说文》之切实。《尔雅》之难过于《说文》十倍,以此见本义易明,而转段之难说也。”<sup>⑨</sup>可知其于《尔雅》用功既深,识见亦颇为独特,则其校勘考证舍人原注,亦必有可观之处。倘能访得廖氏之原稿,再比对赵氏之辑佚,同时广采其他传世文献,重新整理出可靠之定本,必能还原原书固有之真,而有功于传统小学。故舍人原本虽唐初即已亡佚,内容仍大体可窥,欲讨论黔省地方经学成就,亦当以西汉武帝时期为肇端。足证与中央王朝经营开发西南地区同步,儒家思想已开始沿交通驿道传入。遵义既为由蜀经黔入滇之要区,乃有代表性人物舍人专治《尔雅》而崛起,诚

①④⑤ 莫友芝《邵亭杂文燹馀录》卷一《犍为文学传》,见《莫友芝诗文集》下册,第696、696、699页。

② 道光《大定府志》卷二十四《惠人志三》“舍人传”,北京,中华书局,2000年版,第554页。

③ 钱大昕《潜研堂文集》卷三十三《与晦之论尔雅书》:“来书疑舍人为何人。考陆氏《释文》称犍为郡文学卒史臣舍人,汉武帝时待诏;而《广韵》亦有舍姓;是舍人乃其人姓名,非官称也。”(吕友仁标校,上海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9年版,第606页)则舍人乃人名之说,钱氏已先发明之,当一并参阅。

⑥ 张之洞撰,吕幼樵校补,张新民审补《书目答问校补》,贵阳,贵州人民出版社,2004年版,第58—60页。

⑦ 赵旭辑《犍为文学尔雅注稽存》卷首,郑知同序,贵州省博物馆藏清末姚之恢钞本。

⑧ 光绪《井研县志·艺文》,见舒大刚、杨世文编《廖平全集》第11册“附录”,上海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5年版,第717页。

⑨ 廖平《六书旧义·假借篇》,见《廖平全集》第8册,第163页。

如黎庶昌所说“《遵义府志》定舍人为郡产,并非借才于异地,奉为乐祖,其又奚疑?”<sup>①</sup>

## 二、地方经学的鼻祖

《尔雅》一书,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其与《论语》《孝经》同附于“六艺略”之后,今人以为“此乃汉儒心目中之学术分野,亦可谓汉儒尊经尤重于尊儒”<sup>②</sup>。尤宜注意的的是,“孔子定六经,左邱明、卜子夏诸贤作传以发之。其时,总贯六经之训故者则有《尔雅》,然未有依经作注,使其寻绎易了者。(舍)人生于南域,深明训诂,以《尔雅》为六经之津梁,发愤起《尔雅》注”<sup>③</sup>,实最早释经之汉儒<sup>④</sup>,不仅开地方学术的先河,即在经学史上亦有重要地位。

作为最早的训诂专书,《尔雅》“不出于一时一人之手,且又备采众说,以俟折衷”<sup>⑤</sup>。编纂的时间或可溯至战国早期,结集显然不可能晚于汉初;传衍之广及注家之逐渐增多,则与儒家经典地位的上升密切相关。故实为训释五经之重要著述,不妨视为《五经》之字典,亦可视为汉儒之“王官学”。前人多以为勤读即能得九流之通路,多识鸟兽草木之名,做到博览而不惑,有裨于发明经义甚大。正如邢昺《尔雅注疏》序所云“夫《尔雅》者,先儒授教之术,后进索隐之方,诚传注之滥觞,为经籍之枢要者也。”而戴震《尔雅文字考序》说得更加具体:

古故训之书,其传者莫先于《尔雅》,六艺之赖以明也。所以通古今之异言,然后能讽诵乎章句,以求适于至道。刘歆、班固论《尚书》古文经曰“古文读应《尔雅》解古今语而可知。”盖土生三古后,时之相去千百年之久,视夫地之相隔千百里之远,无以异。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,更经学大师转相讲授,而仍留疑义,则时为之也。

余窃谓儒者治经,宜自《尔雅》始。……是书旧注之散见者六家,隄为文学、刘歆、樊光、李巡、郑康成(案:郑氏无《尔雅注》,《周礼·大宗伯疏》误引之耳)、孙炎,皆阙逸,难以辑缀,而世所传郭《注》,复删节不全,邢氏《疏》尤多疏漏。夫援《尔雅》以释《诗》、《书》,据《诗》、《书》以证《尔雅》,由是旁及先秦以上,凡古籍之存者综核条贯,而又本之六书音、声,确然于故训之原,庶几可与于是学。<sup>⑥</sup>

可见《尔雅》一书,实乃治经者必读之书。尤其研治训诂之学,更不能不求之《尔雅》<sup>⑦</sup>。故无论援《尔雅》以释《诗》、《书》,抑或据《诗》、《书》以证《尔雅》,皆为清儒由训诂入经学的具体

① 黎庶昌《拙尊园丛稿》,见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第8辑,台北,文海出版社,1973年版,第269页。

② 钱穆《朱子新学案》上册,成都,巴蜀书社,1986年版,第4页。

③ 道光《大定府志》卷二十四《惠人志三》,道光二十九年刻本。

④ 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北京,中华书局,1998年版,第1202页。

⑤ 段玉裁《经韵楼集》,上海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年版,第86页。

⑥ 戴震《尔雅文字考》,见《戴震全书》第6册,合肥,黄山书社,1995年版,第275页。

⑦ 段玉裁《经韵楼文集补编》卷上《严九能尔雅匡名序》:“凡言训诂之学,必求之《尔雅》矣,虽然求之《尔雅》而不得其所以然之故,但见其汜滥无涯涘,吾未见其熟于《尔雅》之必能通经也,则又求之《说文解字》矣,《说文解字》言形与声与义,无不憬然,读之者于训诂当无不憬然,然吾见读《说文解字》而于经传、《尔雅》愈不能通,鉅语不合,触处皆是,浅人遂谓小学与治经为二事,然则从事小学将以何为也?”文中之立论盖本于此。见《经韵楼集》,第374页。

展开 然亦离不开包括舍人在内的历代注疏家转辗相承所形成的传统<sup>①</sup>。特别是“汉儒注经,皆守师说,不尚新奇,不自臆造,不为附会,不事剽窃,不望文生义,不增字解经,不妄诋古训,不率改经文,无骑墙之见,无固执之谈”<sup>②</sup>,大体均不离河间献王所谓“实事求是”的学问宗旨,与清儒颇好据事征典的学术路径更近。故《尔雅》及舍人等汉儒的旧注,自然就不能不引起戴震一类清代考据家的高度重视了。

尚有必要指出的是,“古代简编,非甚繁重,师弟尤重传授,故历数百年,传十数世,其书仍能不亡,非惟保藏,亦口耳相传之效也”<sup>③</sup>。惜舍人之《尔雅注》一书,历时既久,今已散亡,惟部分佚文尚见于他书,“虽零文只义,皆可葆珍”<sup>④</sup>,今反复稽核比对相关佚文,即不难发现,舍人之旧注,凡草木鸟兽虫鱼之名,均能一一辨而明之,其余虽单词双义,亦必有所依据,可知其于器服典章制度,当也十分稔熟,诚可谓“不失其旧”,“师承极古”,固然可以羽翼《尔雅》一书。无怪乎继其人其书之后,“群儒之为训诂章句者,接踵汉世矣”<sup>⑤</sup>。盖用功既深,为用必宏,故辑佚者代不乏人,清人精研深究《尔雅》者人数不少,乃至蔚成专门性的“雅学”,然若追问导夫先路者,居榜首者仍为西汉时之舍人。

研治《尔雅》一书,足可助人进入经典的世界;如果仍有不足,则当求诸《说文解字》。盖“《说文解字》与经传《尔雅》训诂有不能同者,由六书之有假借也。经传字多假借,而《尔雅》仍之。《说文解字》字无假借,盖六书有义、有音、有形,有义而后有音,有音而后有形。……然则谓《说文》为纲,谓《尔雅》、《方言》、《释名》、《广雅》诸书为目,可也”<sup>⑥</sup>。而两汉时期舍人注《尔雅》在先,尹珍从许慎学《说文》在后<sup>⑦</sup>,均足以说明贵州学者已厕身大传统主流文化,成为儒家正统学术的时代预流者。其中特别是舍人之注《尔雅》,实乃最早与经学有关的小学类撰述,甚有裨于后人旁稽广采,左考右证,成就名物训诂专门术业,芟夷典籍阅读障碍,非但为西南山川人物增光,亦甚有功于吾国传统经学。故道光《遵义府志》遂将其列于乡邦人物传记之首,并详考其生平事履说:

孝武通西南夷,初置犍为,继置牂牁、汶山诸郡,其时榛榛狉狉,风教睢盱。文学以郡人膺学史选,诣阙上书,既挺生古所未臣之地,而即注古所未训之经,其通贯百家,学究天人,与相如、张叔辈上下驰骋,同辟一代绝诣,淑文翁之雅化,导道真之北学,南中若莫先师,断推文学鼻祖。<sup>⑧</sup>

注《尔雅》者,如郭璞、邢昺等,前后凡十余家,皆洽闻强识,为世所重。然溯其渊源,仍以舍人为肇端。故朱彝尊《经义考》“邢氏(昺)《尔雅疏》”条下列举犍为文学(舍人)、刘歆、樊

① 戴震《尔雅注疏笺补序》尚谈到“《尔雅》,六经之通释也;援《尔雅》附经而经明,证《尔雅》以经而《尔雅》明。”可证以《尔雅》与六经互证,乃是清初学人治学的一大取向。就方法论而言,仍可视作以训诂明经义,与晚清以来训诂由附庸而独立为大国,明显存在极大的时代差异。古文字之学,由证经而证史,乃至蔚成专门术业,乃是19世纪以来之一大学术嬗变现象,当值得注意。戴说见《戴震全书》第6册,第276页。

② 丁福保《佛学大辞典》上册,屏东,屏台净宗学会,2002年版,第5页。

③ 金毓黻《中国史学史》,北京,商务印书馆,2007年版,第46页。

④ 黄侃《尔雅略说》,见《新辑黄侃学术文集》,滕志贤编,南京,南京大学出版社,2008年版,第268页。

⑤ 道光《大定府志》卷二十四《惠人志三》,道光二十九年刻本。

⑥ 段玉裁《尔雅匡名序》,载《经韵楼集》,第374—375页。

⑦ 张新民《贵州:学术思想世界重访》,贵阳,贵州人民出版社,2010年版,第15—16页。

⑧ 道光《遵义府志》卷三十三《舍人传》,道光二十一年刻本。

兴、李巡、孙炎、郭景纯等六家《尔雅》注,舍人即居诸家之首<sup>①</sup>。“舍人待诏在汉武帝时,此释经之最古者。”<sup>②</sup>而杭世骏《经解》则以为经书“以注称者,郑玄、王弼、韩康伯之于《易》,郑玄之于《三礼》,郑兴、郑众之于《周官》,隗为文学、刘歆、樊光、李巡、孙炎、郭璞之于《尔雅》,唐明皇之于《孝经》是也”<sup>③</sup>。具见舍人之注《尔雅》,不但为贵州学术文化之开山,地方经学之鼻祖,同时也是汉儒释经之发轫,北学南传之功臣<sup>④</sup>。追溯滇黔地区学术思想发展的远源,则不能不以舍人为第一。

### 三、文翁事业的继承者

稍需提及的是,道光《遵义府志》尚提到相如、张叔、文翁等人。相如即司马相如,以辞赋显名于世,不必赘述。张叔尝从相如游,学成后即返滇教授乡人,可视为滇人文教之鼻祖。而在郑珍、莫友芝等人看来,舍人之文采风流,亦足可与其“上下驰骋,同辟一代绝诣”。至于文翁,则见诸《汉书·循吏传》:

文翁,庐江舒人也。少好学,通《春秋》,以郡县吏察举。景帝末,为蜀郡守,仁爱好教化。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,文翁欲诱进之,乃选郡县小吏……遣诣京师,受业博士,或学律令。……数岁,蜀生皆成就还归,文翁以为右职,用次察举,官有至郡守刺史者。

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,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,为除更徭,高者以补郡县吏,次为孝弟力田。常选学官僮子,使在便坐受事。每出行县,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,使传教令,出入闺阁。县邑吏民见而荣之,数年,争欲为学官弟子,富人至出钱以求之。由是大化,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。至武帝时,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,自文翁为之始云。

文翁终于蜀,吏民为立祠堂,岁时祭祀不绝。至今巴蜀好文雅,文翁之化也。<sup>⑤</sup>具见文翁自觉推行儒教大传统文化,积极化导一方民风习俗,其事甚至在汉武帝诏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之前,不可不说是开风气之先,实乃“儒者在本朝则美政,在下位则美俗”(《荀子·儒效》)政治理想的践履者。而《汉书》正是有鉴于此,将其置于《循吏传》之首,以为当树之风声,垂范后世。明人李廷机撰《汉唐宋名臣录》五卷,收录自汉文翁至宋杜衍凡六十人,黄吉士序谓其“录取严而用意微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六十二《汉唐宋名臣录》),然既以文翁居第一,即可见其人其事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。今人据此认为他的身上明显表现出“吏”与“师”的双重身份,“吏”的身份“虽然曾给他的教化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,但‘吏’与‘师’两种功能却又不是混而不分的。‘吏’的基本职责是维持政治秩序,这是奉行朝廷的法令;‘师’的主要任务则是建立文化秩序,其最后动力来自保存在民间的儒学传统。”<sup>⑥</sup>倘若以孔门“先富后教”的

①② 朱彝尊《经义考》,第1205,1202页。

③ 杭世骏《经解》,见张廷玉等《皇清文颖》卷十二《解》,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影印本。

④ 参阅王燕玉《辨舍人的籍贯、官称和姓名》,见氏著《贵州史专题考》,贵阳,贵州人民出版社,1986年版,第347—354页。

⑤ 《汉书》,北京,中华书局,1962年版,第3625—3626页。

⑥ 余英时《士与中国文化》,上海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3年版,第141页。

观念衡量之<sup>①</sup>,则可说他在“富”与“教”两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<sup>②</sup>。其中郡守的职责固然不能不要求他承担起强化政治秩序的责任,如《华阳国志》称他尝“穿湔江口,灌溉繁田千七顷”<sup>③</sup>,后人亦以为“蜀中江沱禹迹,至李冰而一变,其后文翁穿渝湔洩以溉繁田,则又一小变”<sup>④</sup>,即可视为富民工作的大事。但与此同时,他见当地“承秦之后,学校陵夷,俗好文刻,翁乃立学,遣隼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,还以教授,学徒鳞萃,蜀学比于齐鲁”<sup>⑤</sup>,后人亦称他“修起学宫,弟子学于京师者比齐鲁”<sup>⑥</sup>,更做了大量的教化工作。则文翁既能导人以富,又能示人以教,其所作为完全符合儒教政治理想要求,遂不能不成为后人颇为心仪的功臣典范<sup>⑦</sup>。

由于文翁历来均以化治见称于世,故与“吏”的身份相较,他似乎更有一种“师”的身份自觉。正是“师”的责任伦理的使命召唤,使他能够更主动地从事教化的工作。教化的重点当然是建立礼治文化秩序,所以在班固的笔下,他的“师儒”特征似也透过“化蜀”事迹的描述,获得了强化和突出。这显然也昭示了中国政教合一的久远传统<sup>⑧</sup>。如果以“吏”和“师”来分别表征,则可说“‘吏’代表以法令为中心的政治秩序,‘师’代表以教化为主导的文化秩序;用中国原有的概念说,即是‘政’与‘教’两个传统,也可以称之为‘政统’与‘道统’。这两个传统之间的关系是不即不离的,一方面互相支援,一方面又不断发生矛盾”<sup>⑨</sup>。而郑珍、莫友芝正是着眼于文翁“师”的身份和“教”的传统,才极为关注他在郡守任上的化治工作。至于以舍人为“淑文翁之雅化”的重要历史性人物,当也是依据道统的前后关联才做出的结论。

从整体上看,文翁好学而“通《春秋》”,入仕后复利用郡守职责的方便,积极传播儒家思想文化,开展以建构礼治秩序为主要内容的“化蜀”工作,无疑是儒学南渐的一大功臣。值得注意的是,遵义在地理区位上本属巴蜀文化圈范围,行政上长期归属四川管辖,雍正五年(1727)

① 先富后教的观念,出自《论语·子路》:“子适卫,冉有仆。子曰:‘庶矣哉!’冉有曰:‘既庶矣,又何加焉?’曰:‘富之。’曰:‘既富矣,又何加焉?’曰:‘教之。’”兹说影响后世深远,发挥者既多,践履者亦不少,实已构成儒家建构政治秩序的一大核心观念。

② 按李如兰(雍正)《四川通志序》:“窃闻圣门之论治道,其要在富之教之。……李冰治水、文翁兴学以来,其渐开富教之端。”(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)据此可知,将文翁视为颇能代表儒门先富后教秩序建构理想的典范,乃是以前人固有之一贯看法为根据得出的结论。

③⑤ 常璩著,刘琳校注《华阳国志校注》,第214页。

④⑥ 胡渭著,邹逸麟点校《禹贡锥指》,上海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6年版,第275-678页。

⑦ 文翁对贵州的影响,自明代中央王朝逐渐加大经营开发力度以来,便不断有人提及,如明代翰林院侍讲学士彭华撰《贵州等处提刑按察使题名记》,便特别强调说“嗟夫!革夷异风,风教所从来者,岂独限于山川哉?郡鄙染于商纣,恒代袭于燕丹,其不为夷几何?蜀之弘诵自文翁而兴,闽之文物因常袞而盛,遂与邹鲁相争,所谓风俗与化移易自然也。方今诞敷教化,以变辟陋之俗,朝廷固付之有司,而操黜陟之权,任激扬之责,使有司遵循礼法以导民者,不尤在风纪之官耶?”李梦阳撰《送席副使监贵州监贵州屯学二事歌》,亦有句云“大抵夷狄似禽鸟,制之虽勤忌拘急。此曹亦是人心性,顷来渐慕衣冠习。文翁化蜀岂无本,李牧屯田务招辑。”则文翁之事迹,虽屡经时代之变迁,仍不时唤起后人之记忆,成为化导地方民风方习俗之重要感召资源。可见其主要以文教典范垂训后世,才更多地西南地区发挥其影响的。彭华之说见弘治《贵州图经新志》卷一《贵州宣慰使司上》,贵阳,贵州人民出版社,2015年版,第15-16页;李氏之诗则见嘉靖《贵州通志》卷十一《艺文志》“歌类”,贵阳,贵州人民出版社,2015年版,第611页。

⑧ 《汉书·地理志》称“文翁为蜀守,教民读书法令,未能笃信道德,反以好文刺讥,贵慕权势。”反映文翁固然有重教化,即“师”的一面,但也有重法令,即“吏”的另一面。比观其两面而加以客观分析,显然即为政教合一的典型性表现。而汉初虽崇尚黄老,然申、韩、苏、秦之学作为辅助,仍与其他百家之学并存而有所流传,故文翁之所作所为,也反映了援儒入法、儒法杂糅,即儒学由式微而渐趋显赫的时代发展趋势。

⑨ 余英时《士与中国文化》,上海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3年版,第147页。

始改隶贵州省<sup>①</sup>。故四川各地亦多舍人传说。如“今乐山县乌尤山,故有尔雅台,方志以为汉犍为舍人注《尔雅》处。在乌尤寺之北,构屋崖上,濒临绝壁,沫水西来,与泯江合,流经其下,大峨诸峰,远峙于前,乌尤山一胜境也。”<sup>②</sup>可见今川黔两地,均为舍人活动区域,遗迹既多,传说亦不少。则道光《遵义府志》之所以以舍人比附文翁,一方面固然由于他出身文学,与文翁一样,均为朝廷命官,且一治《春秋》,一好《尔雅》,都明显具有“师儒”的特点;一方面则为犍为与成都均同属南中之地,二人无论间接直接,是后是先,都有功于儒学的南渐,都为推动地方文化风气的转移树立了具体的行为典范。然略有不同的是,舍人较倾向于大传统学术文化的重构,文翁则更关注小传统礼俗风规的再造。故“文翁终于蜀,吏民为立祠堂,岁时祭祀不绝”;舍人亦追随于文翁之后,“导道真之北学”,“南中若莫先师,断推文学为鼻祖”。从清人的视域观察,斯二人均有功于地方秩序的国家化发展,都是儒教秩序扎根西南不可忽视的早期推动者,故不可不连类述及而一并表彰。如此则既能扩大移风易俗秩序再造工作必须依赖的正统合法资源,也可强化朴学学统谱系建构工作理当借用的汉学传统根据。

#### 四、传播文教的盛览

舍人之后,尚有两人可述。一是西汉武帝时的牂牁(今贵州大部分地区)名士盛览(字长通),司马相如入西南夷,览尝从其学赋;再即毋敛(今正安)人尹珍,东汉桓帝时官至荆州刺史,曾从许慎、应奉受经书、图纬。尹珍一生事迹,当另撰专文详考。兹仅略述盛览初传文教之事,或可一窥中原与西南文化交流状况。按《西京杂记》卷二载盛览尝问司马相如如何作赋,“相如曰:‘合纂组以成文,列锦绣而为质,一经一纬,一宫一商,此赋之迹也。赋家之心,苞括宇宙,总览人物,斯乃得之于内,不可得而传。’览乃作《合组歌》、《列锦赋》而退,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。”<sup>③</sup>盛览学成后,“归以授其乡人,文教始开”<sup>④</sup>。后人以为“司马相如答盛览论赋曰:‘赋家之心,得之于内,不可得而传。’诗家妙谛,无过此数语。”<sup>⑤</sup>其说虽立足于诗歌创作发论,然仍可见评价之高。

西汉武帝时期经营西南夷,或开发或放弃,究竟应当如何处置,朝廷一度争论激烈。司马相如则力主经略开通,曾撰《喻巴蜀檄》、《难蜀父老书》,均为关涉西南史事之重要文献。《史记》本传云:“相如为郎数岁,会唐蒙使略通夜郎、西夷中,发巴、蜀吏卒千人,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,用兴法诛其渠率。巴、蜀民大惊恐。上闻之,乃遣相如责唐蒙,因谕告巴、蜀民以非上意。”相如则向汉武帝建言:“邛、笮、犍、駉者近蜀,道亦易通,秦时尝通为郡县,至汉兴而罢。今诚复通,为置郡县,愈于南夷。”汉武帝以为然,“乃拜相如为中郎将,建节往使。……略定西夷,邛、笮、冉、駉、斯榆之君,皆请为内臣。除边关,关益斥,西至沫、若水,南至牂牁为徼,通零

① 参阅《清史稿·地理志》“贵州遵义府”,北京,中华书局,1977年版,第1362页。

② 刘锡嘏、王培德《尔雅台答问序》,见《马一浮集》第一册,杭州,浙江古籍出版社、浙江教育出版社,1996年版,第491页。

③ 葛洪撰,周天游校注《西京杂记》,西安,三秦出版社,2006年版,第93页。

④ 道光《遵义府志》卷三十三《盛览传》。又明人谢肇淛《滇略》卷六《献略》、雍正《四川通志》卷二十七《古迹》俱称盛览撰有《赋心》四卷。姑附于此,以供参考。

⑤ 王士禛《香祖笔记》卷七“司马相如答盛览论赋”,宣统三年扫叶山房石印本。

关道 桥孙水,以通邛都。还报天子,天子大说。”<sup>①</sup>可见盛览最早之问学请益,极有可能即在司马相如出使西南之时。清人田雯即有“汉司马相如曾西至滇,授经盛览”之说<sup>②</sup>。然亦不排斥其以后北上中原,继续向相如求教的可能,否则“归以授乡人”云云,便无从谈起。惟盛览与相如初次见面之时间,考《难蜀父老书》有“汉兴七十有八载”一语,《集解》引徐广曰“元光六年(前129年)也。”则至迟汉武帝元光五年,相如即已出使至西夷<sup>③</sup>,盛览之前往请益,亦当在是年稍后。二人既切磋如何作赋,必多有过从。惜年久事湮,已无从详考。

西汉王朝之经略西南夷及开设郡县,显然不能不以道路之开通为基本前提。《史记·平准书》载“唐蒙、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,凿山通道千余里,以广巴蜀,巴蜀之民罢焉。”即可见道路修筑颇耗人力财力,然亦有裨于经济文化之交流发展。相如既极力主张开通西南夷,直接与御史大夫公孙弘罢废高论对立,如其在《喻巴蜀檄》中所说,目的主要为“存抚天下,辑安中国”,则必然乐于与盛览一类的精英交往,以结好地方士人,争取他们的主动支持。时西南夷与中原地区文化风俗差异甚大,故中央王朝之经略开发亦多反复周折<sup>④</sup>。而相如与盛览一北一南,均打破了地缘时空的分殊与隔阂,相互切磋讨论精英阶层才有的作赋之法,固然首先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,但未尝不是区域文化传播史上的大事,说明与国家权力经营开发西南边地同步,汉地文化也渐次传入了当地,推动了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,其中开发兴起较早之“蜀学”,当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中间桥梁作用<sup>⑤</sup>。而国家与地方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,亦因此或多或少总有所缓解。如果站在国家大一统格局的整体立场看,也可说“凡今滇黔闽越之疆,朝鲜、顺化之壤,所由光华文治,黼黻皇风,半皆帝之开辟蚕丛,创通蛮服,昔也鳞介,今也衣裳,美哉禹功,明德远矣。”<sup>⑥</sup>故司马相如主张开通西南夷,功固然不可轻忽,而盛览之初传文教,事亦值得表彰。足证追溯中原与西南学术文化交往的远源,其人其事皆堪称不可忘怀的掌故美谈。故历代地方志书载之者甚多,均无不以为当大书深刻于史册。

## 五、余 论

舍人、盛览二人,一首注《尔雅》,开地方经学之先河;一从司马相如游学,大得赋家不传之心,均可谓崛起于西南地区的一代豪杰,沟通中原文化与西南文化的桥梁式人物。他们之所以能够“北学中国”,成为地方学术文化的早期创辟者,固然离不开个人的才情兴趣,关涉师徒之间学问路数的传承授受,但也明显受到汉武帝经略开发西南夷整体格局形势的影响,不可不说是国家与地方频繁互动关系催生出来的文化生命成果。倘若追溯地方学术文化的远源,梳理

① 以上均见《史记·司马相如传》,北京,中华书局,1959年版,第9册,第3044—3047页。

② 田雯《古欢堂集》卷二十四《万行草诗序》,贵州省图书馆藏乾隆年间刻本。

③ 参阅方国瑜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》第1册,北京,中华书局,1984年版,第42页。

④ 参阅张新民《司马迁、班固的民族观及史学实证精神异同论:从〈史记〉、〈汉书〉“西南夷传”谈起》,载《民族研究》1993年6期。

⑤ 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“司马相如游宦京师,诸侯以文辞显于世,乡党慕循其迹,……由文翁倡其教,相如为之师,故孔子曰‘有教无类。’”可见他们二人不仅是“蜀学”兴起的早期典范,而且也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式代表。

⑥ 皮锡瑞《汉武帝论》,见吴仰湘编《中国近代思想文库·皮锡瑞卷》,北京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13年版,第23页。

学派分化组合的支派谱系,斯二人尽管可供钩沉发覆的史料不多,然对后世的象征性影响仍极为巨大,既形成了古今对话的历史性张力,代表了一个久远传统的早期发展进程,也激活了边地文化中心化的历史记忆,引发了了士大夫群体主流文化认同的自觉感。<sup>①</sup>

清人高度评价舍人、盛览等人,可以陈矩的话为代表“黔南江山灵秀,贤豪挺生,若汉犍为文学舍公,长通盛公,后汉道真尹公,德行经学词章,方之蜀都四子,殆无愧色(杨升庵先生《〈全蜀艺文志〉序》称相如、君平、王褒、子云为四子)黔中不可谓无人矣!”<sup>②</sup>当然,川、滇、黔三省相互接壤,舍人、盛览等人亦往往为三省地方人士共荐俎豆,儒学在西南地区的早期传播,必然也声气息息相通。从清人的文化视域观察,一旦形成清季学术与汉代学统遥相契应对接的学人群体共识,在他们看来则不仅延长了学术谱系传承绵延的历史时间维度,而且更张大了地方学术文化资源积累的空间地缘声势。故清代无论川、滇、黔三省,表彰斯二人者甚多,重视程度远非其他任何时代可比。具见舍人、盛览生活的时代虽在西汉,但历史记忆复活的时代却主要在清季。讨论汉人事迹必关注清人的评论,亦时隔事通内在理路的必然。这当然也是文化传播史上常见的现象,触媒的酵素往往要遇到异代知己才能酿出成功的“异熟果”。

(责任编辑:慎 独)

① 参阅张新民《大一统冲动与地方文化意识的觉醒》,载《中国文化研究》2002年第4期。

② 陈矩《淮海易谈跋》,见顾久主编《黔南丛书》第七辑,贵阳,贵州人民出版社,2014年版,第187页。